

谈谈满洲名称问题

王钟翰

(中央民族大学)

满洲名称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从上世纪日本学者市村瓚次郎^①起，直至十年前（1996年）我国两位学者王昊、张甫白还撰写了《满洲名称考释》^②一文，迄今尚未见有新作发表。或者鄙人孤陋寡闻，未及寓目亦未可知。

一 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

“九一八”（1931年）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它御用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③，据当时报载，其疆域四至之大，不但包括今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河北省承德市一带），而且还囊括了外蒙（今蒙古国）之东部，更企图瓜分今北京市东部（山海关内东南一带）为其边界区。以此类推，则平（北京）、津（天津）、潼（潼关）、洛（洛阳），莫不成为伪满洲国的边境了。封豕长蛇，得陇望蜀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日本的野心政治家和狡猾外交家早就认为“满洲”这个名称易于利用，每每发表文章或简短消息，以淆惑欧美人以及中国人的理解和视听。因此，我国爱国学者宁承恩教授撰写《辽宁省沿革及满洲人考》^④（*Historical Accou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Manchus*）提交到1929年国际外交讨论会，力辟日本人之狂妄及其狼子野心。后来宁教授将其文章的一部分《满洲字义考》译成汉文，刊登在《东北丛刊》第一册中，后又于1933年5月复就本文略加删改润饰，转载于《北平新晨报·东北问题栏》。^⑤其用意所在，路人皆知！当时我的燕大学长冯家昇教授奋笔疾书，作《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一文，刊登于《东方杂志》上，视为宁文之“补”或“续”亦无不可。

1. 始于布库里雍顺说

据清人记载：满洲族（简称满族）均发祥于长白山一带，其先盖金遗部，定三姓之乱，国号“满洲”^⑥自此始。

2. 始于清太祖说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齐逐渐征服各部^⑦（建州部包括苏克苏浒河、浑河、完颜、栋鄂，长白部包括纳殷、珠舍里、鸭绿部，扈伦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东海部包括窝集、瓦尔喀、虎尔哈等）。

3. 始于清太宗之伪造说

近人谓改建州为满洲，实起于清太宗皇太极之伪造。^⑧

4. 讳后金改满洲说

满洲一词最早见于癸丑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三年），其时太祖已建号“后金”，是满洲^⑨为太宗所讳而追改耳。

5. 满洲为清亮之说

此说始于罗斯牧师（The Rev, J. Ross），他著有《满洲人》一书，以满洲一字解释为“清亮”之意^⑩，西欧人多从之。

6. 满洲为勇猛之说

明末女真人（即满族之先人），女真语中之“满洲”（mong），其义为“勇猛”，故就其字义而用为国号^⑪，如元、明耳。

7. 因地产珠命名之说

此说见史禄国之《满洲人之社会组织》（SM. Shirog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意谓“满洲”土产名珠，遂名“满珠地”^⑫，此说由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之谕旨误会而来。

8. 因得救于猪而命名之说

相传古时东夷有一酋长因战败逃入猪圈而号其国为“满猪”，讹转而为“满洲”^⑬。

9. 为满仲之重出说

日本伊文贞夫据《义经》之先有名满仲者，为“满洲”^⑭所自出。

10. 由肃慎之音转

按肃慎一作息慎，亦作稷慎。而女真因避辽兴宗讳，改称“女直”，亦作“女贞”“女质”，亦作“虑真”，为“满洲”^⑮之音转。

11. 由勿吉、靺鞨之音转

“勿吉”音转变“靺鞨”，又转为“满洲”。^⑯故“靺鞨”读作 mo - hsich，转为“满殊”（man - ju），再转而为“满洲”^⑰也。

12. 由满节之音转

宋邢昺《论语注疏》中九夷之名，四曰满节。满节音读 Man - Chieh，转为“满殊”，再转为“满洲”，^⑱

13. 由瞞咄而得名

按《隋书·室韦传》云南室韦分25部，每部有莫弗瞞咄，犹“酋长也”。又同书《靺鞨传》云“渠帅曰大莫弗瞞咄”。由瞞咄转而为乌珠，再转而为“满洲”^⑲也。

14. 出自梵文“文殊师利”之说

按曼殊师利即文殊菩萨，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满洲”^⑳名称之由来盖本于此。

15. 出自建州女真尊号满住说

建州一部族，可称为以满住为酋长之部族，则谓之为“满洲部族”^㉑，犹之称国为王国、帝国、侯国之类耳。

冯家昇教授乃因前述各说，或有未尽，复申己见，作一小结：“满洲”一词载见《满文老档》者，最早在清太祖（努尔哈齐）称天命之前三年（1613年），已如上述，今据朝鲜记录（亦即日人稻叶君山所据者，见其所著《满洲发达史》），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之春，朝鲜援明都元帅姜弘立加入明军，以征伐清太祖，中途为清军所掳，将其谒见太祖，姜见太祖之下部俱以“满住”称号太祖，加于“汗”之尊号上。按清太祖天命元年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为天命三年（1618年），时在建号后金改号大清之间。以“满住”称号太祖，且加于汗之尊号上，则可知为“满住汗”与“后金国汗”命意同，“满住汗”当称“满洲汗”。^㉒足证清太宗皇太极伪造说之不可信，而《满文老档》所载之为有据也。

最后，冯教授概括为：满洲绝非太宗皇太极所伪造；汉字之“满洲”或起于太祖努尔哈齐太宗皇太极之间，满音之“满洲”必早见于太祖以前^②，决无可疑者也。

以冯文发表于1933年9月，迄今2002年3月，七十载光阴忽焉已过，翰亦垂垂老矣！虽与冯兄同时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但冯兄已转攻古维吾尔（突厥）文与史，不复顾及满族史与文，未十载即归道山。此固冯兄一人之不幸，而尤为史学界之大不幸也。

翰专攻清史，满族史虽亦有年，而殊乏有所心得与建树，自愧马齿徒增，有负前贤与师长之教诲多矣。即以“满洲”一词为例，虽不乏一得之愚与一孔之见，而迄未撰就专文发表，以就教于世之专家学者。今仍将平日未成就之浅见寡识写出，固未暇计及是否得失也。

前已提及，王昊、张甫白两同志曾指出：“满洲这个名称当源于本土，非外地来。其籍贯名称在东土，不会舍此东土内的固有名称，而用已自称为满洲后的曼殊为满洲名之所本。”^③王昊、张甫白两同志所说“满洲名称当源于本土，非外地来”甚是，而又称“用已自称为满洲后的曼殊为满洲名之所本”则非是。依翰所见，满洲一名当由靺鞨而来：一则满洲（Manchu - Manju - Manjei）即与靺鞨拼音相一致，换言之，“满洲”与“靺鞨”本为一字。靺鞨自隋唐以降，直至明中期即已散居于今吉林长春市以南迄于今辽宁新宾县一带长达一千年之久，历史事实可为佐证。二则新兴之满族，本为女真人之一支，至努尔哈齐始大，而自明初始终被编于建州左、右卫之列，为明帝国之藩属，一代未之或改。清天聪十年（1636年）十月改族名为满洲，而不用女真旧称者，以明人对女真人之仇视故也。而满洲本即靺鞨之一音异译，故采用旧称“靺鞨”改作“满洲”，即前此所谓“满洲”名称源于本土，而非来自外地，故对内或对外，各得其所，莫此为甚者此也。

注释：

「日本」市村瓊次郎著：《清朝国号考》（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报告）；[日本]内藤虎次郎博士著：《清朝姓氏考》（《读史丛录》）；[日本]稻叶岩吉博士著：《满洲开国说话四历史的考察》（《光海君时代之满鲜关系别录》）；[日本]阿倍健夫学士著：《八旗研究》（《东亚人文学报》第一卷第四号同第二卷第二号）。中国学者章炳麟氏著：《清建国别记》；朱希祖氏著：《后金国汗姓氏考》（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并参见[日本]西春秋著：《清祖姓氏考》，刊于《书香》（大连图书馆编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十六卷第十号。

②④见《史学旬刊》1996年第三期，吉林大学历史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孟森著：《满洲名义考》，见《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亦可参考拙著《清史余考》，第28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参见冯家昇教授著：《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小序》，见下注引。

见《东方杂志》，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1933年9月28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出版。

⑥参见拙文《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载于拙著《清史续考》，第15~19页，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93年9月版。

⑦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⑧见前引日人市村瓊次郎与稻叶君山之说，参注。

⑨[日本]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载《东北丛刊》第十四期。

⑩⑪⑫⑬⑭冯家昇著：《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第一节，第68页；第二节，第691页；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⑮⑯⑰⑱冯家昇著：《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第70页。

⑲⑳㉑㉒冯家昇著：《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第71页。

㉓冯家昇著：《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第72页。

从承德避暑山庄看康乾盛世的忧患意识

王戎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康雍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清政府为什么就在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进攻之下一败涂地了呢？这可从多方面去探讨，但康乾盛世缺乏忧患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忧患意识不仅是治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治家的至理名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当是孔子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及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居安思危”以及“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

我不是说康雍乾三帝毫无忧患意识，而是说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一 纵向比较，可以称之为“盛世”

康雍乾百年间，是否可以称之为盛世，这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从纵向看，与以往几千年的中国史比较，康雍乾是可以称之为“盛世”的。

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盛世。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最大的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光照史册。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显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如果作横向比较，康雍乾百余年间，清政府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给后世留下了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历史经验。

二 康雍乾三帝忧患意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倡导“满语骑射”，修建木兰围场，就是忧患意识的表现。

康熙帝说：“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还命令全国各省驻防官兵每年都要行猎习武。^②

清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行围习武，是为了保持“骑射”民族的传统，也是为了使军事力量处于一种常备不懈的状态。木兰行围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深层次的政治含义在于加强对蒙古的管理。魏源总结说：“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③

康熙帝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这是马背上民族的一种习惯看法。围猎的办法能否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是很值得怀疑的。围场和战场是完全不同的。战场上的对手，是战前受过训练并有充分准备拼死一搏的敌人。除了要拼射杀技能外，还要拼综合实力，拼后勤保障，拼智谋，拼敌情掌握程度。要拼搏的内容多得很，不是围场的狩猎活动可以学得到的。战场上的双方是人，都是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人。战场上的敌我形势瞬息万变，战场的位置和开战的时间不能由单方面来选择的，因此可能遇到未及预测各种情况。风沙弥漫、大雨滂沱、冰天雪地、烈日酷暑也得上战场。遇到崇山峻岭、急流险峰、羊肠小道、绵延丛林，也得上战场。总之，只要是上战场，从士兵到统帅，都要和敌人斗智斗勇，都要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争取胜利。围场则不同，时间和地点是由自己选择的，山川河流基本面貌长年不变。围场上的猎物，没有还击之力，只不过是仓皇逃命的动物。个别凶猛的野兽，在一群猎手的追赶下，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咆哮几声，在绝望中等待射杀。围场，各地的围场也包括木兰围场，都不是训练军队的场所。单靠这种场所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上不了战场的。

康熙帝的忧患意识表现在北方边防，但忽视了东南的海防。中国有辽阔的海疆，有漫长的海岸线，由于清政府长期忽视海防建设，使中国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仅有的一些水面战船，其作用在于追捕海盗、缉拿走私，根本起不到海疆防卫作用。嘉庆年间蔡牵为首的一支海上力量，横行东南海面，打得清政府晕头转向。清代兵制中，长期没有统领全国水师的领导机构，只是由封疆大吏各自管理辖区的战船。清代的战船长期没有定型，往往仿自商船，或者临时征用商船，加装陆用兵器。这时的东南海疆，并非风平浪静，西方殖民者常有武装侵扰，甚至强占过中国领土，这是不能不引起警觉的。可是清政府面对来自海上的敌对势力，而是采取消极的禁海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甚至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康熙年间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千余艘，这本是振兴中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

这时，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拓新市场，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这个时期的中国，面对新世界的新形势没有觉察，没有作为。清代前期，没有海权观念，轻视海防建设，实是一大失策。

康熙皇帝也有可圈可点的忧患意识，比如，对人口剧增的忧虑。在中国，最早为人口剧增而感到忧虑的是清圣祖玄烨，当人口问题还不十分严重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就指出“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对此“时深軫念”。这是可贵的思想火花。

清朝皇帝的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只重视弯弓跃马，不看重枪炮水师。忧患的重点在北方的噶尔丹和沙俄，忽视了从海上入侵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而重点中的重点是消除任何形式的反清活动，武装的反清活动是用血腥手段予以彻底镇压，文字的甚至是思想深处的反清活动，或者被怀疑为有反清情绪的，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其酷烈程度康雍乾百余年间一代超过一代。为了钳制读书人的思想，康雍乾三帝把八股取士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扼杀了一切创新思维，后患无穷。乾隆朝编《四库全书》时的“寓禁于征”方针，也是禁锢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政策。

三 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

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是缺乏忧患意识的一种表现。康雍乾三朝在京城西郊修建的“三山五园”，名闻天下。所谓“三山”，就是万寿山、香山、玉泉山。所谓“五园”，就是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在京城西郊修建“三山五园”的同时，又修建了避暑山庄。

三藩之乱尚未平定，台湾也未收复，全国统一尚未实现，这时还说不上已出现盛世。康熙皇帝便开始在北京西郊修建第一座清代的皇家园林——沁心园（后改名静明园）。该园位于西山东麓，颐和园西侧，是清代最早修建的一座行宫。稍后又建另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占地1000多亩，大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建成。

静宜园在北京西山，现称香山公园。园内的大小建筑群共50余处，经乾隆皇帝的题字或赋诗有28景。作为28景之首的是勤政殿，位于公园的东宫门内。这座皇家园林中所有著名景点，都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先后劫掠焚毁。“勤政殿”只剩断垣残壁，“香雾窟”只留下部分台基，被现代游人称之为“平台”。

清漪园是一座以自然山水为主要结构的大型皇家园林，集我国南北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建，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完成，总共历时15年。是乾隆皇帝为庆祝母后60大寿而兴建的，是盛世所修的又一座皇家园林。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清光绪年间，慈禧在遗址上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破坏，1903年修复。

圆明园，原是康熙帝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的一座小型的园林，面积约600亩。胤禛即位后，是为雍正帝。雍正帝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全园面积扩至3000余亩。据《日下旧闻载》，圆明园40景中，经雍正帝题名的有28景。乾隆皇帝扩建了园内建筑群，充实和改造了园内景观，总面积达5200余亩，园内建筑群达百余处。汇集了我国南北园林的秀丽，可以说是江南风景名胜在北国的再现，是天然和人工的和谐统一。乾隆帝对西方园林建筑似有特殊兴趣，特命在华

供职的西方传教士督造西洋楼六幢，大型喷泉三组，以及一些与之衬托的西洋园林小品。在园内还有一些古代印度式样的建筑。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后记》中对圆明园有过这样的描述：“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这个叹为观止的天宝地灵之区，在 1860 年遭英法侵略军劫掠，40 年后又遭八国联军洗劫，能运走的运走了，不能运走便砸烂，砸不烂的便烧，留下来的是一座国耻纪念的遗址。

在修建“三山五园”的同时，又于京城东北方向 200 多公里处修建了避暑山庄，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是在畅春园建成之后不久开始兴建的，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圆明园，这是清代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建成，历时 90 年。建成之日，正是英国国王致书乾隆皇帝要求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到北京觐见乾隆帝的那一年。

避暑山庄占地面积达 564 万平方米，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是清代园林式的皇宫，为了实现安抚和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一座夏宫，是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百余处。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现已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以上列举的只是皇家园林，还不包括京城内外王爷们的豪邸园林。康雍乾百余年间，这些享乐型的土木建筑工程及雕梁画栋的装饰接连不断，甚至每年都有几项同时进行。这里所消耗的不仅是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而且消耗了最宝贵的节用爱民的精神。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皇帝如此，王公贵族们自然也群起效尤了，只要不涉嫌僭越就行。任何一个辉煌的盛世，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这是康雍乾盛世的一大失策，也是康雍乾诸帝的一大失德。

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是最热心兴建皇家园林的一个皇帝。他即位以后，先后改建和扩建了“三山五园”，并继续加紧修建避暑山庄。到了晚年，他却忏悔了，而且是非常沉痛的忏悔。对于皇家园林，对于避暑山庄，他认为“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避暑山庄后序》中说：

若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臆萝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

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既以自戒，仍警告我后人。若后人忘予此言，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①

乾隆帝这一段忏悔，我认为是发自内心的。他认识到“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真是难能可贵。可惜已经太晚了。这时的大清皇朝，国库空虚，武备衰弱，奸臣当道，贪污横行，言路阻塞，危机四伏，造反者待机而发。

乾隆帝的忏悔，连他的继承人都当一回事。嘉庆在位 25 年，去避暑山庄竟有 17 次，举行“木兰秋狝”14 次。当骨鲠忠直之言官以乾隆帝的《避暑山庄后序》劝阻嘉庆皇帝时，嘉庆帝竟龙颜大怒，威胁以“阻挠大典”治罪。这一点倒是被乾隆帝言中了：“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

乾隆帝死后不久，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这次不是避暑而是避难。他在这里被迫批准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卖国条约。盛世所修的皇家宫苑，竟成了批准卖国条约的屈辱场所。另一座盛世所修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成了英法侵略军的焚掠对象。盛世所修的皇家园林清漪园、静宜园，也被英法联军焚毁。

乾隆帝对于“南巡”，也有过沉痛的忏悔。“盛世南巡”与“盛世修园”一样，表现出缺乏忧患意识。康熙帝和乾隆帝都多次举行过大规模的南巡。康熙帝的六次南巡，比较俭朴，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雍正帝没有南巡。而乾隆帝的六次南巡，大讲排场，挥霍无度，地方官员竭力奉承，不顾百姓死活，弄得民间怨声载道。他退位以后，曾对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⑤嘉庆皇帝即位以后真的没有南巡。不过主要不是有感于乾隆帝的忏悔，而是东南海上的蔡牵、川楚数省的白莲教，闹得他寝食不安，哪有那种寓情江南山水的闲情逸致。

四 礼品的警示

中国人最早认识西洋火炮比中国先进的是徐光启。他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了解西洋火器十分锐利，上疏明熹宗，“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⑥。明清两代几个皇帝先后请耶稣会士龙华民、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人协助制造西洋火炮，俗称红衣大炮，亦称佛朗机炮。这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机会把握得是不错的，明末清初各军事集团都利用过西洋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的。他乘坐的“狮子号”，是一艘中等战舰，其上配备有64门火炮。同时还带来一批足以开阔视野的祝寿礼品。这又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虽然不能全面地看到西方世界，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洋的火枪、火炮、战舰和尖端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这时却没有一个像徐光启那样的人，给乾隆皇帝上书，“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即使有这样的上书，乾隆皇帝也不会“善其言”。因为在乾隆帝的心目中，该有的中国都有了。

我们来看看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大小小小一共590件，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件：

一件巨型的天文地理仪器，拆分15箱装运。这个庞然大物是“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所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象，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规矩，何时应遇日蚀、月蚀及星辰之愆，俱显著于架上。并有年月日时之指引及时辰钟，历历可观。”^⑦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天圆地方”的陈旧知识占绝对统治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一件小型的天文仪器，显示地球与日月星辰一起运动，“与学习天文地理者有益”。

长短自来火枪12支。这种火枪冠名“自来火”，或称“自来火新法”，或称“新法自来火”，从火枪发展的历史进程推测，点火方式已不是用“火绳”，而是用机械撞击取火的方法点燃炸药。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图片^⑧可以帮我们作出肯定的判断，这是一种燧发枪。从形制上看，有一支在扳机上装有护圈，另一支上装有瞄准具。是滑膛还是线膛，从图片上看不出来，留待日后研究。不过线膛枪在欧美早已出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美国已用一种新式的线膛步枪装备步兵团参加独立战争。这种线膛步枪射程远、命中精度高。这种枪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15年即已作为制式武器装备部队。英使的礼品中，还有一种“成对相联火枪二杆”，这当是一种双管火枪。从火绳枪到燧发枪，是火枪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枪是利用弹簧的力量，扣动扳机，使燧石

撞击在火门边上，冒出的火星点燃火药。燧发枪的出现与应用，简化了枪械的发射过程，同时也提高了射击精度。燧发枪在欧洲枪械史上占据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定，黑火药已有了重大改进。理由是：既然利用燧石的火星点燃火药，那黑火药的三种成分（硝酸钾、硫磺和木炭），必须按合理的比例混合，制成颗粒状才可能用于燧发枪。

礼品中还有铜炮西瓜炮数个。“西瓜炮”未见实物，亦未见图片，不知其构造和性能。但可断定是一种新的火炮，不是 17 世纪中叶在中国威风过一阵子的那种红衣炮，而是新一代的洋炮。否则使团不会带来若干炮兵，准备在乾隆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时，在御前试演。乾隆帝竟不屑一看，更不用说仿造了。

有一个战舰模型，是装有一百门铜炮的大战舰。还特地说明，“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欲选极大之船，送贡差至天朝。但内洋水浅，大船难以进口”。这种说明，有炫耀之嫌。这艘战舰模型约高 5 尺余，长 5 尺余。从海军发展史看，它当然是一艘巨型的风帆木质战舰模型，铁甲蒸汽战舰还要晚几十年才出现。中国当时的战船，最大的也不过装二三十门火炮。

从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看，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算，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如火炮、火枪及战舰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乾隆皇帝似乎已感觉到这种落后，但他不愿公开承认。他仍然把这些看作是奇技淫巧，是贡品，是供收藏玩赏的玩物。

他也想到要学习洋人的这些长技，但不是用于发展科学和巩固国防，而是担心洋人回国之后，如何拆卸挪移，挪移之后如何重新组装。乾隆帝的指示十分明确：“现在有该国匠役在国内装饰，若不趁此时，将如何装卸之法，预为留心学习，将来该匠役回国后，不特不能移动，倘其中枢纽，稍有损坏，又用何人修理，岂不成弃物？”乾隆帝还指示：“多一人即多一人之心思，安国宁等既情愿前往，自应听其随同观看学习，尤可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庶将来该国匠役回国后，可以拆卸挪移，随时修理，更为妥善。”可见，乾隆帝已经意识到中国在科技和国防方面落后西方很远，但他对此没有学习的渴望，也没有丝毫的危机感。

五 落后挨打的预兆

明清之际，中国在天文历算、火炮铸造、地理测绘等高科技及国防科技领域已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崇祯、顺治、康熙明清两代帝王以及朝野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学习并采纳了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迎头赶上并超过他们的一个良好时机。不过当时那些认识到中国已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落后的严重后果。东南沿海虽然发生过几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扰，甚至是武装冲突，但没有引起任何警觉。

乾隆皇帝对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访，并非完全没有警觉；至少他从使团提出的要求中，已经感觉到来者不善。

在使团所提要求中，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性质的有如下几项：

（一）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英国船只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要求在舟山群岛划出一个小岛，作为居留地，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存放货物，且可自由居住往来。

（二）要求在广州附近同样划出一块地方，归英国商人使用，停泊商船，存放货物。

（三）允许英商在北京建立贸易栈房，允许传教士在各地传教。

清政府从英国人的这些要求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凌辱，是一种无理的勒索。这引起了乾隆皇

帝的反感和警觉。他不断颁发谕旨，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加强戒备。指出这些英国人心怀叵测，可能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借端生事。

当时乾隆帝的认识，就到这个程度。这是他的一点有限的忧患意识。如果我们把它与马戛尔尼暗藏杀机的话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忧患意识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马戛尔尼认为：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 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⑨。

当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正陶醉在盛世的欢乐中时，心怀叵测的祝寿客人们却把这个盛世比喻为“破败不堪的旧船”，并且在假设英国人进攻与否，预言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在外国人进攻时结局如何。话说得如此狠毒，如此尖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简直就不堪一击。可惜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却没有同样深刻的思维，没有从中国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防脆弱中得出应有教训。没有想到应当奋发图强，急起直追。他们对落后的危险性，没有产生任何忧患意识，依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朝上国”，依然把自己看作是无所不有的富庶之邦，乾隆皇帝依然陶醉在他的“十全武功”之中。

六 亡羊而不补牢

亡羊补牢，只要下最大的决心，应该说还是来得及的。但由于这几位盛世帝王的忧患意识不强，或者说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亡羊”而不“补牢”，最后把“补牢”的机会也断送了。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补牢”的上策当然是澄清吏治，清除贪污腐败，充实国库，励精图治，重振军威，努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可是在乾隆帝的心目中，可能以为根本无此必要，中国已经够强盛的了，在他的治理下已经是太平盛世了。清除贪污腐败，对乾隆帝来讲恐怕是最不愿意作出的选择。他的宠臣和珅就是拦路虎，有他挡道，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就不必多去讨论了。

“补牢”的中策是改变传统观念，开展对外贸易。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贸被纳入“朝贡”的模式之中。外国来华贸易被看作是“臣服”，是“朝贡”，是“倾心向化”。康雍乾几朝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却是可有可无的”。清代前期对进出口贸易采取严厉限制政策，朝野上下毫无国际贸易竞争意识，尽管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铜、火枪、火炮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也不失为充实国库、增强国防之一途。选择这条路同样也是困难的，最大的困难是改变对外贸易的传统观念。

“补牢”的下策是整顿军队，革除八旗、绿营中的积弊以提高战斗力，这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提倡“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坚持的祖宗之法。但是到了雍乾二帝执政的时候，八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雄风，逐渐失去了作为国家常备军的战斗能力。也许有人认为这时西方国家已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但要知道，黑火药兵器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主导地位，是十分漫长的过程。

特别是挥舞战刀的骑兵，直到 20 世纪中期，轻重机枪及新式火炮虽已广泛使用，骑兵部队仍然作为特殊兵种驰骋疆场，立下过赫赫战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军步兵武器主要还是前装滑膛燧发枪。部分英军装备较先进，是用雷管击发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仍是前装滑膛，弹丸仍是球形，装药速度慢，弹丸出膛没有稳定弹道，射程短，命中精度低。持有这种武器的步兵形成的方阵，对敌人有心理上的威慑力，但经不起同等数量的骑兵的集团冲锋。因为这种火枪装填火药费时费事，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子弹，而且瞎火多。假设以一千名训练有素的持有这种武器的士兵与一千名训练有素的挥舞马刀的骑兵对阵。步兵方阵在一分钟内总共只能射出 1000 发子弹（按战前已填好火药计算，而且不计瞎火），有效射程约一百余米。这就是说，在接近步兵方阵的一百余米距离内，共有一千发子弹射出，算是有杀伤力的最危险地区。可是飞驰的骑兵通过这个最危险的地带（百余米）只需要 10 秒，最多 15 秒钟。未被击中或只受轻伤的骑兵冲进了步兵方阵，这些步兵是根本无法招架的。配备给步兵使用的火炮也无法发扬火力。如果骑兵采取惯用的长途奔袭、迂回包抄战术，运动中的持有这种燧发枪或击发枪的士兵，一个冲锋就乱了阵脚，根本不是疾驰如飞的骑兵的对手。这时燧发枪、击发枪的枪管上虽已装有枪刺，也抵挡不了骑兵的冲杀。对骑兵的战斗力的估计，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计。

可悲的是，清军原有的八旗劲旅，早已腐败不堪，连绿营也没有战斗力了。而乾隆皇帝面对着落后挨打的预兆，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像整顿军队，革除八旗绿营中的积弊以提高战斗力这种必须做而且可以做到的工作都没有下决心去做。至于万里海疆，更没有防患于未然意识。到了嘉庆帝当政的时候，八旗、绿营的腐败懦弱已经不可救药，只有靠临时募集的乡勇了。嘉庆帝有一段谕军机大臣的话说得很深刻，表明他对这种局面已经无可奈何了。原文如下：

向来各军营遇贼打仗，总以绿营居前，令其冲锋接刃，而健卫、火器二营及东三省兵（引者按：均指八旗兵），俱在绿营之后，朕所素知。自添募乡勇后，则又令乡勇前敌，以撙贼锋。设遇挫创，则绿营及满兵先退；一得胜仗，则攘以为功，而首先陷阵之乡勇转致不能邀赏。即如军营中节次打仗得胜，所保俱系满兵，绿营亦间有保列。至于乡勇，则据实保奏者甚少。此实向来积弊。行军之道，全在赏罚公平，方能鼓励戎行，争先效用。若任满兵及绿营等冒功请赏，而转使实在出力之乡勇多有屈抑，何得为事理之平？伊等见无功者屡邀奖赏，而有功者转置不录，岂能使之用命！^①

军队腐败到这种程度，即使给它最好的武器，给它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枪火炮，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木兰秋狝”，并没有达到“围猎以讲武事”的目的。康熙帝和乾隆帝几乎年年都去围猎，而八旗和绿营竟然腐败到了怕上战场的地步。落后挨打的命运，在康乾盛世时已经注定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与其说是败于军事，不如说是败于政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至理名言。

注释：

《清圣祖实录》卷 102，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1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乙丑。

魏源：《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纪一》第 100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 2 月版。

转引自刘玉文：《避暑山庄的扩建与高宗晚年的自省》，载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论丛》，紫禁城出

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清史稿》卷 357,《吴熊光传》。

⑥ 《明史》卷 251,《徐光启传》。

⑦所引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公司 1996 年版。

⑧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乾隆朝上,第 309 页,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⑨转达引自[英]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 523 页,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⑩ 《清仁宗实录》卷 59,嘉庆五年二月壬辰。

参考文献:

1. [美] T. N. 杜普伊著:严瑞池、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 2 刘玉文:《避暑山庄的扩建与高宗晚年的自省》,载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论丛》,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3.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 1984 年 2 月版。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公司 1996 年版。

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策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边疆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对其管辖的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和措施。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策是中国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开展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心灵亮点，也是世人认识中国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我们对比稍做认识的升华和哲理的思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留下的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

这就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地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是在今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权因内部原因（如政权腐败、政治分裂、经济崩溃等）或外部原因（如外敌入侵等），引发内外交困、社会动乱而垮台时，就会有一个新生的较有生气的政权接替前者，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王朝兴衰交替。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分裂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中心的代表，而且努力将这种愿望付诸实践。在经过一番时间或长或短，过程或顺利或曲折的努力后，一个更大范围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就诞生了。到了清代前期，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进入近代，外来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同时自身内部的社会危机也日益加重，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并没有由此土崩瓦解，面对国难，中国人开始了新的寻求富国强邦之路的历程，经过百余年奋斗，一个崭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发展起来。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基础，边疆地区的

发展状况也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长期发展的产物，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在通过相互交流、相互通婚等渠道达到相互融合、相互同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中华民族的称号虽然是在近代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中才出现的，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了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的血统而形成了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其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或和或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互相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这种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呈现螺旋形上升的态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但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反抗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共同的家园。一旦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加强，中华民族这一称号成为激励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强大力量，而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结成了更为牢固的整体。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两大历史遗产，也是我们必须认识的特殊的国情。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产生与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所谓物，是指广阔的地域，以及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各种物质力量；所谓人，则是指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好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政策成为中国人民两大历史遗产存在这一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它既是两大历史遗产形成的连接点，也是促成两大历史遗产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的再认识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自身的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彼朝彼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粗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的统一王朝和大一统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经济开发政策，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言之有：

1. 羁縻与怀柔

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唐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①这里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就是羁縻府州的设立。

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所谓怀柔，实际上就是笼络，是招徕安抚，这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传统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包括封爵、给俸、朝觐制度等，以笼络边疆民族上层首领，进一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2. 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

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②。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在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分掌

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

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施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一面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 从和亲到联姻

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

唐朝的和亲总计有 27 起，与之和亲的民族有吐谷浑、奚、契丹、突骑施、宁远国等，特别是与回纥和亲，目的是为了借助回纥的力量平定内乱，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与回纥 7 起和亲，有三人是皇帝的亲生女儿。

我国历史上和亲范围最大，并且具有双向性性质的莫过于清朝。有清一代，已经从以往和亲，发展到大规模的联姻。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满蒙联姻的根本目的是巩固满蒙的政治联盟，使蒙古族更好地成为清朝的北部屏属，从而确保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皇太极共有 15 位后妃，其中有 7 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雎宫的宸妃，都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 19 位后妃，其中 6 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 40 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 13 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 2000 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 500 余人，敖汉旗下 600 人，巴林王旗下 170 余人。乾隆皇帝曾做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③

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者有：俸禄俸级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赐恤致祭制。

因此，汉、唐、清的和亲与联姻，尽管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在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交往，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近几十年为史家所颂扬、文坛所讴歌，但超越真理即成谬误，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以鞭挞的。

4. 经济开发

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开发，任何一个有志于治理边疆的王朝统治者都知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和推动边疆与内地的民间交往。

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田戍边活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尤其是统

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新疆为例试作说明。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一个大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 105 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 69 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 630 年开始计算，至 8 世纪末，前后长达 160 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缁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①。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程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前期各族军民共垦地 301.9 万余亩（即 20.13 万公顷）；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通观历代王朝新疆屯田的兴衰史，不难发现一个普遍性规律，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新疆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两者相辅相成，互成因果，因此屯垦戍边作为新疆开发的重要手段成为历代边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保障中原地区与边疆的民间交往，更是有力促进各民族间和好交往，以及内地边疆一体化进程的有效措施。

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出发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客观上也必然促进民族间的交融，从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三 以史为鉴的启示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研究历史必须面对现实。研究中国边疆史，以及边疆史中很重要的内容边疆政策时，同样要面对现实，当前中国边疆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呢？简言之，一是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二是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此意义上以下六点启示值得思考。

（一）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边疆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大局。内地和边疆，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宁失千军，不失寸土”这个古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从边疆的特殊战略地位来看，在国家的总体治理中，对边疆地区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更多的政策上倾斜。

（二）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广义的边疆治理，包含管理和开发两个方面，开发即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是保证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历代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如汉、唐、清在治理边疆时均注意到这一点，并取得了成效。但封建王朝毕竟有极大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如清政府在边疆地区重“稳定”，轻发展，出于阶级私利有意识地保护落后，以利统治，致使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也是历史事实。小平同志曾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他还说：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当然是指全国而言，但是用在边疆地区更有针对性。所以为了边疆地区